

新编方志十二编

欧阳发 丁 剑 编 著

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

新編方志十二編

(修訂本)

欧阳发

丁剑

編著

安徽省地方志編纂委员会

编 者 的 话

新方志编纂

第一版

近几年来，由于工作上的关系，我们撰写了若干篇关于新方志编纂方面的专题讲义，虽多次讲授于省内外修志人员培训班，但较为粗略、不系统。为了适应新志编纂的需要，我们把原来的讲义删补修改，汇集成书，内部发行，以供本省各地修志学习和参考，同时与外省进行交流，广泛征求意见。

新志编纂是个新课题。由于笔者雏犊学犁，知识浅薄，研讨不深，错误之处，在所难免。加之，分头撰写，时间仓促，论点岐异、内容重复、文风不一等缺点亦较明显。我们真诚地期待着同志们的批评与指正。

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吸收了国内方志界专家、学者的研究成果，并得到了全国许多单位领导和同志的指点与帮助，特别是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董一博同志，不耻下交，在百忙中为本书题签；洪钢、胡文武两同志参加了全书校对工作，均在此表示谢意！

新方志编纂

第二版

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日于合肥

目 录

第一讲 中国方志概述

- (一) 方志的起源..... (1)
- (二) 方志的发展..... (3)
- (三) 安徽方志沿革..... (15)

第二讲 方志的类别、性质

- (一) 方志的类别..... (19)
- (二) 方志的性质..... (23)

第三讲 新编方志的意义

- (一) 新编地方志可为“两个文明”建设服务... (28)
- (二) 新编地方志可以起到存史的作用..... (32)

第四讲 方志的体例、篇目

- (一) 何谓体例..... (35)
- (二) 方志体例的发展和类型..... (37)
- (三) 方志体例的继承与创造..... (44)
- (四) 新方志篇目设计..... (49)
- (五) 拟定篇目中的若干问题..... (56)

第五讲 如何征集资料

- (一) 征集资料的范围..... (59)

(二) 资料来源和征集办法·····	(61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(三) 如何整理、鉴别资料·····	(67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第六讲 如何编写概述编

(一) 关于概述编名称问题·····	(73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(二) 概述编意义·····	(75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(三) 概述编内容·····	(78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(四) 概述编文体·····	(80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第七讲 如何编写大事记

(一) 大事记的演进·····	(83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(二) 大事记的内容·····	(84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(三) 大事记的体例·····	(86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(四) 大事记中如何记述政治运动·····	(89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(五) 编写大事记的要求·····	(91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(六) 大事记编写中的若干问题·····	(93)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第八讲 如何编写专志

(一) 专志编写的基本原则·····	(96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(二) 各类专志编写的具体提示·····	(102)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(三) 专志编写中的若干问题·····	(115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九讲 如何编写人物志

(一) 人物立传的范围和标准·····	(118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(二) 方志传记的体式和要求·····	(124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(三) 人物志编写中的若干问题·····	(128)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十讲 图、表

- (一) 关于图.....(133)
- (二) 关于表.....(142)

第十一讲 序、跋、凡例、附录及其它

- (一) 关于序、跋.....(150)
- (二) 关于凡例.....(156)
- (三) 关于杂志(记)、附录.....(159)
- 附: 《万年县志·序》、《呼玛县志·序言》

第十二讲 新志编纂中的若干问题

- (一) 关于方志成书的方法问题.....(169)
- (二) 关于遵守疆界和断限的问题.....(171)
- (三) 关于引进新的学科成果的问题.....(173)
- (四) 关于“志书类辞书的”问题.....(175)
- (五) 关于执简驭繁的问题.....(176)
- (六) 关于志书的保密问题.....(179)
- (七) 关于审稿标准问题.....(181)
- (八) 关于地区简志问题.....(183)
- (九) 关于志书文体问题.....(186)

附录

- 关于“合志”.....(189)
- 关于山志.....(197)

第一讲 中国方志概述

(一) 方志的起源

关于方志的起源，历代史志学者的说法是不大一致的。

有的认为方志起源于史。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从“志为史体”角度出发，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记载地方史事的书笈，如晋之《乘》、楚之《檮杌》、鲁之《春秋》等，应是最早的方志。因此有所谓“最古之史，实为方志”之说。后代许多学者也认为这些史书，类似后来的地方志，具有地方志的雏形，应称为方志之源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方志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，可惜这些史书已失传，无从考察其体例和内容。

有的认为方志脱胎于地理。即所谓方志导源于《禹贡》、《山海经》之说，认为方志是从舆地学科（地理书）演变而来的。《禹贡》是《尚书》中的一篇。作者不详，著作时代无定论，近代多数学者认为约在战国时。这部书用自然分区方法，记述当时我国的地理情况，把全国分为九州，假托为夏禹治水以后的政区制度，详细记载了当时黄河流域的山岭、河流、薮泽、土壤、物产、贡赋、交通等。长江、淮河等流域也有记载，但较为粗略。是我国最早一部科学价值很高的地理著作。《山海经》，共有十八篇，是由《山经》、《海经》、《大荒经》等三部分组成。作者不详，各篇著作时代

亦无定论，近代学者多数认为不出于一时一人之手，其中十四篇是战国时作品，《海经》内四篇则为西汉初年作品。内容主要为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，包括山川、道里、民族、物产、药物、祭祀、巫医等，保存了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说。事实上，从体裁到内容，这两部地理书对方志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大，致使历代地方志，多与地理书混杂相兼。

有的认为方志不仅导源于《山海经》和《禹贡》，而且同《周官》也有渊源关系。周官指周朝王室的官制，后成书《周礼》亦称《周官》。宋代司马光在《河南志序》中认为，周官中的职方、土训、诵训的职掌，于后世方志都不无相似之处。在方志导源于《周官》这点上，章学诚与司马氏的观点是一致的。

还有的认为《越绝书》、《吴越春秋》、《华阳国志》为方志的鼻祖。持这种观点的学者，是从这几本书的体例和内容更近似方志而言的。因此，清代方志学家洪亮吉在《澄城县志》序中说：“一方之志，始于《越绝》。”《越绝书》十五卷，为东汉袁康所撰，记述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地方（今浙江和江苏一部分地区）的历史沿革、城市建设、山川、人物、生产情况和风俗习惯等内容，与后世方志的体例、内容相近。《吴越春秋》全书十五卷，为东汉赵焯撰，记吴越二国兴亡始末，今存十卷，前五卷叙吴，起自太伯，迄于夫差，后五卷记越，始于无余，终于勾践。是书只记人物，不载地理及都邑，就方志而论，虽比不上《越绝书》充实和周备，但对后世影响也很大。为此，范文澜认为“东汉会稽郡人赵焯著《吴越春秋》，又有无名氏著《越绝书》，两书专记本地掌故，开方志的先例。”《华阳国志》，晋·

常璩撰，全书十二卷，附录一卷，记述以巴蜀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地理沿革和历史变迁。对于政治、历史人物等方面的记载尤为详尽。也有些学者认为它是方志的前身。

对此，谭其骧教授有不同看法，他认为“史”与“志”不同，东汉的《越绝书》、《吴越春秋》以及《华阳国志》与隋唐以后的地方志不同，是地方史。

以上几种说法，都是有一定道理的。现在有些地方志专家、学者认为，方志并非起自一源，而是多源。我国地方志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从各方面吸取源泉而逐步发展演化而来的。

（二）方志的发展

方志的发展，一般来说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，秦代以前偏重于历史，汉唐时期偏重于舆地，自宋以后则是史志合一，谓之“史志体”。如果从“史志体”的方志而言，它孕育于汉晋，成型于两宋，发展于元明，隆盛于清代，民国又有新的变化。

1、从秦汉到隋唐以前的方志

秦始皇统一中国，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局面，推行郡县制度，实行中央集权，各国的史书遭禁毁，修史之权收归中央。因为统一国家的出现，封建统治阶级又需要了解郡国的情况，做到胸有全局，于是要求地方将舆地详情上报，这就为方志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。所以，确切地说，秦汉以前的方志，不过是“一国之史”而已。方志的产生也是社

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时候的产物。

随着生产的发展，汉魏六朝时期，私修史志有了很大的发展。这个时期内，地方志有三类著述：第一类，地理志（主风土）。多记一方疆界、区域、山川、道里、户口、民情、风俗等。其中以汉代朱干的《地理书》；后汉应劭《十三州记》；晋·挚虞《几服经》；陈·顾野王《舆地志》；北魏阚骃《十三州志》等较有名。可惜这些皆已失传。第二类，郡书（主人物）。多记郡国乡邦先贤、耆旧节行，用以叙功劝善，传之久远。著名的有《三辅耆旧传》、《鲁国先贤传》、《京兆耆旧传》、《会稽贡举簿》、《陈留耆旧传》、《汉中耆旧传》、《雍州学官志》、《兖州山阴先贤传》等，这些实为一方之人物志。第三类，都邑志。多载城池、郭邑、官阙、花囿、观阁、仓廩、陵庙、行廛等，辨其规模，明其制度。如《三辅黄图》、《长安图》、《西京黄图》、《关辅古语》、《三辅宫殿名》等。

上述三类著述，各以其所载内容和所取形式开创了后世方志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及至《越绝书》出，内容兼记人物、地理和都邑等门类，体例亦趋完善，已初具了方志的规模。

魏晋时期的各类志书，大都早已亡佚，传世者屈指可数。其中保存最完整，史料价值最高的是《华阳国志》。这部书兼记地理、历史、人物，特别对于政治历史人物的记载尤为详尽。例如陈寿《三国志》记诸葛亮南征不到三十个字（“三年春，亮率众南征，其秋悉平。军资所出，国以富饶，乃治戎讲武，以俟大举。”）裴松之作注也不详，而《华阳国志》有七百多字的记载，包括进军路线，战争情节、善后措施等方面都有记述。又如李冰修都江堰，《史记》、

《汉书》记载都很简略，但在《华阳国志》记载就较为丰富。《华阳国志》的作者很重视口头资料的收集，其中还记载了一个“石牛便金”的故事，十分有趣。总之，《华阳国志》取材广泛，内容繁富，所以吕大防称赞这本书“蜀记之可观，未有过于此者。”

除《越绝书》、《华阳国志》外，这一时期还有后汉赵炳的《吴越春秋》、三国·吴·韦昭的《三吴郡国志》、三国·吴·顾启期的《娄地记》等方志代表作。

2、隋唐时期的方志

隋唐时期，中国已成为当时世界上以繁荣富强和高度文明著称的国家。这期间，方志由私撰一变而成为官修。官修志书的好处是在短时间内，集中足够的人力和资料，由史馆（后世为志局）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组织，分工合作，一般成书较快。官修制度促进了方志的发展。

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载：“隋大业中（605—617年）普诏天下诸郡，采其风俗、物产、地图，上于尚书。”故隋代有《诸郡物产土俗记》一百三十一卷，《区宇图记》一百二十九卷，《诸州图经集》一百卷，其余记注甚众。这些地理总志卷帙之众多，和内容的繁富，为前代志书所莫及，也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纂修这一类志书创立了格局，奠定了基础。

到了唐代，纂修图经制度比隋朝更加严密，由皇帝下诏，全国各州府每三年（一度改为五年）一造图经，送尚书省兵部职方。于是不仅有当朝的史官、名臣亲自撰写方志，而且各郡府也相继写出一大批反映地方地理、政治、人物等

方面的概括的地方志，不仅取材较前广泛，而且在详略适中，记叙有法，内容真实等方面，也远非前志能比。

唐代纂修的第一部地理总志是《括地志》五百五十卷，作者李泰是唐太宗的第四子，从贞观十二年（638年）撰修到贞观十六年（642年）成书，历时五年。全面记载了各地的建置沿革、山川形胜、河流沟渠、风俗物产、往古遗迹以及人物故实等等。李世民赞许说“博采方志，得于旧闻，旁求故老，考于传信，内殫九服，外极八方，简而能周，博而尤要，度越前载，垂之不朽”。但《括地志》有个严重缺陷，有志无图，内容不能算是完备。德宗贞元年间，鸿胪卿贾耽撰《海内华夷图》和《古今郡国道县四夷述》二书，有图有说，图说并行，并以图闻名于世。

唐代全国性总志的代表作是李吉甫的《元和郡县图志》。全书四十卷，以唐制分别记述各府州县户口、沿革、山川、道里、贡赋等项，卷首并附图，南宋时图已亡佚，书名也从此略称《元和郡县志》。由于作者是两任宰相，精于地理，熟悉各方面情况，因此，所著“详细得中，记叙有法”。这部书不仅是魏晋以来保留下来的最古一部总志，也是最好的一部。

唐代方志的主要形式是图经。当时所修的图经已经是遍及全国，连边远州县也不例外。敦煌发现的唐人图经就有《沙州图经》、《沙州都督府图经》、《西州图经》等。其中《沙州图经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经，修于开元年间，距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，从今天残存的部分看，文字简洁，叙事明爽，除记载当地行政机构和区划外，对于那里的天象、蓄水、渠、泽、堰、堤、驿、县学、社稷坛、杂神、寺庙、

家、古城、祥瑞、歌谣、古迹等都有详略不同的描述。从体例上看，分门别类，有图有说，综合记录，已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方志体例。

这一时期的方志，有个明显的趋势：一是记述地方的方志，虽然还多以图经、图记、地记为名号，但开始称之为“图志”或“志”；并且“经”和“志”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，图的地位和作用明显缩小。二是这时的志书，为了加强封建中央政权的统治，对人民的财富进行进一步的搜刮，增加了“四方贡赋、建置治军、因时制度、事迹人俗”等门类，由过去单纯记载地理方面的志书，开始地理、政事并重。这些在方志发展史上都是一个大的进步。

3、两宋时期的方志

经过五代十国的长期动乱，使国家典籍沦亡殆尽，为了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，北宋政权建立后，对包括地方志在内的文化典籍的征集和编纂特别重视。它承袭了唐代三年一造图经的制度，规定“凡土地所产、风俗所尚，具古今典废之因，州县之籍，迁闰岁造图以进。”徽宗大观元年(1107年)朝廷还设置专门的中央修志机构“九域图志局”。

宋代的地方经济，比之前代更为发达，客观上需要有一种综合性的记录。因此，宋志沿着两个方向发展，一是上继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、《元和郡县志》而兴全国性的区域志，一是总汇地记、图经而创州、郡志。

宋代方志在我国方志史上地位是很重要的。一是数量众多。据统计，宋志总数近六百种，大大超过了历代方志的总和，几乎“僻陋之邦，偏小之邑，亦必有记录焉。”（《仙溪

志》)二是从体例到内容更为完备,具有首创精神。汉、唐方志多数详于地理而略于人文,或专记某一方面,应该说是太不完备的方志。到北宋时的方志,如乐史撰《太平寰宇记》,于地理之外,增加了姓氏、人物、风俗数门,在人物中又增加了官爵、诗词艺文等内容,使方志的体例大变。这一重要突破,使方志由舆地之书迈向了史学领域,极大地提高了地方志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。三是从名称上,由称图经、图志改称为志。例如,《严州图经》在绍兴年间的刻本改称《新定志》。严格地说,地方志发展到南宋才算定型下来。

这时期著名的志书有: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,二百卷。太平兴国时基本完成。作者杂取山经地志,纂成此书,始于东京,终于“四夷”。除因袭《元和郡县志》门类外,又增加风俗、姓氏、人物、土产等门,为后来总志体例的沿据。后人评论这部书,“采摭繁富,惟取赅博”。并说方志“记载是书而始详,体例亦自是而大变。”因此,是书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。

王存《元丰九域志》,十卷,元丰十年(1080)成书,八年(1085)颁布。体例因袭唐《十道图》、宋《九域图》等图经,而取消其地图部分。以熙宁、元丰间四京、二十三路为标准,分路记载府、州、军、监、县之户口、乡镇、山泽、道里等项。对各地区间四至八到,叙述最详,州县土贡,又备载额数,足资考核。

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,原书二百卷,仅存四卷,成书在嘉定、宝庆间。这部书是采用述地记人两汇合的体例的典型。王象之自序说:是书“以郡之因革,见之编首,而诸邑次

之”郡之风俗又次之 其他如山川之英华,人物之传说,与夫诗章文翰之关于风土者,皆附见焉”。对后代有一定的影响。

宋敏求《长安志》,二十卷。为考订长安古迹的专书。详于记载长安城郭、宫殿、坊市等。是我国古代有关长安地志的重要著作。

《临安三志》,临安有志始于祥符,但已久失不传。宋南渡后建都临安,乾道三年(1167年),府尹周淙始为之志,即所谓“乾道志”,现存南宋方志,当以此为最古。其后施谔于淳熙十二年(1252年)重事增辑,成若干卷,称为《淳熙志》。潜说友继之又为《咸淳志》,书成于咸淳四年(1268年)。三者各有所长,为世所重,称为《临安三志》。这三本志书,都体现了宋志叙事详明,体例简洁的优点,其中又以施谔《淳熙志》为最著名。

此外,还有罗愿的《新安志》(徽州志),梁克家的《三山志》(福州志),陈耆卿的《赤城志》(台州志),杨潜的《云间志》(松江志),范致能的《吴郡志》,施武子的《会稽志》等都有一定的名气。但朱彝尊批评说:“每患其太简”。从这些志的名称中,我们还可以发现宋志的一个特点,即州县志书往往不直标某州县志,而动援古郡或山水以为名。

总的说来,宋修方志从时代来看,南宋多于北宋;从地方来看,南方多于北方。但宋代方志流传下来的不多,现存宋志大约不超过三十种,无论是探讨方志的源流,还是研究宋代历史,都有它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4、元明时期的方志

元代属于少数民族统治,但方志传统并未中断。元统一

中原以后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封建帝国，“北逾阴山，西极流沙，东尽辽左，南越海表”（元史·地理志）。世祖至元二十三年（1286年）集贤大学士扎马拉鼎奏称：“方今尺地一民，尽入版籍，宜为书以明一统”。世祖采纳了这个建议，遂命扎马拉鼎、卢应龙等以职方所上版图，纂辑为志，二十八年（1291年）书成，凡七五五卷。后增为一千三百卷，定名为《大元大一统志》。

《大元大一统志》以每路和行政省直辖的府、州为纲，分建置、沿革、坊郭、乡镇、里至、山川、土产、风俗、形胜、古迹、宦迹、人物、仙释等门，内容详富，为明清官修总志纂修的兰本。这部志书无论从史志价值和学术地位都有一定地位，可以说元代志书的最大成就修纂了这部《大元大一统志》。

元代纂修的州县志数量不多，见于著录的大约不超过一百六十种，保存下来的仅有十一种，其中也有一些佳作，颇有特色。例如，至元年间的《嘉禾志》，详考金石文字。至正年间的《金陵新志》，条理井然。大德年间的《昌国州图志》，有条不紊。以及于钦的《齐乘》和李好文的《长安志图》均相当著名。

明代修志的成就很大。据《中国地方志综录》著录明代地方志为七百七十种，一万零八十七卷。这个时期方志发展的特点：一是官方对修志特别重视。开国之初就着手纂修方志，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下诏编纂（《大明志书》），为了划一规格体例，永乐年间曾两次颁降修志条例，确定志书内容应包括建置沿革、分野疆域、城池、山川、城郭、镇市、土产、贡赋、风俗、户口、学校、军卫、郡里廨舍、寺观、祠

庙、桥梁、古迹、宦迹、人物、仙释、杂志、诗文二十一类。这种做法前所未有。二是注重为要镇重关修志。这是因为明朝与蒙古交恶，北部边防极重，反映边务图志之多远远远超越前代。如郑晓纂修的嘉靖《九边图志》，万历四年（1576年）刘效祖纂修的《四镇三关志》十卷（四镇：蓟、昌、辽、保；三关：居庸、紫荆、山海），嘉靖二十七年（1548年）王士翘纂修的《西关志》三十卷（其中居庸关志十卷、紫荆关志八卷、倒马关志七卷、故关志七卷）以及《山海关志》等。三是地方纂修州县志蔚然成风。有些地方一修再修，所以明代县志很普遍，万历《满城县志》张邦政序说：“今天下自国史外，郡邑莫不有志。”反映了这种情况。四是从理论上探求方志的性质、意义和功用，总结历代修志经验，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。例如嘉靖直隶《池州府志》序谓：“志者记也，所以纪事之实也，即四方之史也。”认为方志属于历史。《曲沃县志》的主修者刘鲁生认为一部好的方志应当是：“其载欲悉，其事欲核，其书欲直”。这就开辟了清代方志学的蹊径。

明代著名方志有：正德《武功县志》，康海撰。康为武功人，弘治进士，官修撰，以救李阳事削籍回乡，此志即回乡后所作。全书三卷，分七篇：凡山川、城郭、古迹、宅墓归以地理篇；官署、学校、津梁、市集归以建置篇；祠庙、寺观归以祠祀篇；户口、物产附于田赋篇；艺文则用《吴郡志》例，散附各条之下，以除冗滥。全书二万余言，此志以文简事核见称于世。《四库总目》评论说“乡国之史，莫良于此”。“后来志乘，多以康氏为宗。”可见影响之大。这部志还有一个显著特点，在人物方面有褒有贬，恶善并著。